

鲁迅 钱钟书 平行论

刘玉凯 著



河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河北省教委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1997 年度河北省教委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鲁迅钱钟书平行论

刘玉凯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任文京
封面设计 张志伟
责任印制 闻利

鲁迅钱钟书平行论

刘玉凯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保定合作路4号河北大学院内)
邮政编码:071002 电话:501852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8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1028-448-7/I·106

定价:15.00元

“我用我法，卿用卿法”

——《鲁迅钱钟书平行论》序

陈漱渝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钟书散文》中，选收了钱老给我的一封信，有人因此误认为我跟他老人家多有接触。事实上，寒舍跟钱老的寓所虽然只横隔了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未敢造访。钱老是宁静淡泊、闭门自守之人，我怎敢以一些琐事贸然相扰！钱老说得妙：“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非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但有一次机会，我得以瞻仰钱老的风采。那是1986年10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钱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坐在台上致开幕词，我以与会代表的身份在台下洗耳恭听。他讲的是：“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愈宽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讲话结束时，他操英、法、德等多种外语对与会的外国学者表示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鲁迅和钱钟书都是充分吮吸了“中外文化”养分的学者型作家，或曰作家型学者。据统计，鲁迅翻译了14国近100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他本人的创作中，涉及了25个国家的380多

位外国人士。鲁迅藏书中也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仅各类拓片就有近五千张。鲁迅在他早期的文言论文中，提出过“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宏伟纲领。他为人类留下的瑰丽的文化遗产，就是中西文化撞击、融合、提升的精神结晶。

如果要寻找钱钟书跟鲁迅的主要共同点，那就是他跟鲁迅一样，博采中外，熔铸古今，是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牵线人”。他的《谈艺录》援引的中外文学资料多达1100多种，其中征引历代各家诗话达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代表作无一遗漏。他的《管锥编》征引了四千位作者的上万种著作，其中涉及的西方作家和学者在千人以上，西方著作约1800种。学识之渊博，令人望洋兴叹。

刘玉凯兄的新著《鲁迅钱钟书平行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让这两位大师跨越时空障碍进行精神对话：既用钱的材料“解”鲁迅，也用鲁的材料“证”钱钟书。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也可以帮我们认识钱，更可以从对比中领会若干诗规艺律。所谓“读钱解鲁”，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鲁迅置于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观照。经过玉凯兄历时四五年的努力，本书不仅考证出鲁迅作品中的一些词源，破解了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典故，而且比较了钱鲁二人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的异同，并对鲁迅作品中一些令人困惑、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

坦白地说，我至今并未通览玉凯兄的这部新著；但作为《鲁迅研究月刊》的主编，我有幸先睹了其中的一些章节，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通过“读钱”，玉凯兄领悟到鲁迅作品中“无物之阵”中的“无物”反映出战斗者的倨傲之态，领悟到九斤老太的“退婴论”其实就是一种“荣古虐今”的病态心理。通过“读钱”，玉凯兄提出《阿Q正传》揭示的精神胜利法跟《管锥编》揭示的“慰情退步”一脉相承；鲁迅杂文中多次批判把外来事物无不说成“古已有之”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其实就是钱钟书否定的“用夏变夷”的文化现象。通过“读钱”，玉凯兄还指出鲁迅式的“偏激”其实是一种针对

性极强的立论方式，恰如钱钟书所云：“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书中最见功力的似乎是《〈故事新编〉艺术新论》一章。玉凯兄通过“读钱”提出了以下看法：《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包含了鲁迅的社会意识、幽默性情和游戏笔墨的叙事语式，是一种从讲唱文学发展而来的既跳进又跳出的“间离叙事法”。这种“戏笔”收到了古今杂糅、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又仍然使读者感到今是今，古是古，鬼是鬼，人是人，不会混沌一片。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这种“破体”创造，证实了钱钟书在《管锥编》中的论断：“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这种看法，显然在王瑶等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之上，又把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用事实表明作为当今显学的鲁迅研究还远远没有臻于止境。

跟那些故弄玄虚、大量堆砌让读者莫名其妙其实作者本人也一知半解的新名词的皇皇巨制比较起来，玉凯兄的这部专著是朴素的，又是厚实的，恰如他这位不矫情、不张狂、粗胳膊粗腿的燕赵大汉。当然，跟任何一部学术专著一样，《鲁迅钱钟书平行论》论及的具体问题也是有限的，但玉凯兄在研究方法上的求新，对读者的启示却是深远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思维技巧，一种科学手段，一种观察角度。它能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现象，提出新理论，找到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一部人类科技发明史充分证明，任何学科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进展，都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越是研究得深入，就越需要更新研究方法。方法运用得当，就会如英国培根所言，“跛足而不迷路的人能赶上虽健步如飞但误入迷途的人”；方法不当，则会像恩格斯形容的那样，“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所以，我认为玉凯兄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价值要超过这部专著学术成就的本身。

当然，究竟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二要考虑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条件。不能东施效颦，不能亦步亦趋。

钱钟书先生说：“我用我法，卿用卿法”。玉凯兄也说他是“自说自话”，讲的是同一个道理。玉凯兄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对鲁迅作品研究较深，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方面又有广泛的爱好和深厚的根底。有一段时间，他还承担了钱钟书研究的新课题。正是具备了上述条件和机缘，他才可能选择和运用“读钱解鲁”的研究方法。如果更换另外一个研究者，也许就不一定具有这方面的学术兴趣和驾驭这种研究方法的能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记不清哪本书上说过，有位古代商人偶然发现阿拉伯地区没有大蒜，于是不顾路途艰辛，用骆驼运去一批大蒜。当地人感激不尽，便用一袋黄金作为回赠。另一位商人得知这一生财之道，便又历尽艰辛运去一批大葱。当地人觉得大葱的味道比大蒜更好，用黄金已无法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便回赠了这位商人一袋大蒜，使这位看风头、追时髦的商人黄金梦彻底幻灭。我想，今后有志于在鲁迅研究园地上继续开拓的人，当然会记取这位卖大葱的商人的教训。

关于文体与方法论(自序)

不论是研究鲁迅,还是研究钱钟书,积久用心,深思熟虑,总可以写出书来,如果再适应一点读者的好恶,一时便可流传,获得嘉赞,这是写书人并不奢侈的愿望。人之患不仅在于“好为人师”,还有好出头露面,显示名声,老百姓管这叫:好露脸。都是一个意思。《〈尔雅〉叙》结语云:“辄复拥篲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文心雕龙·序志》云:“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刘知几《史通·自叙》结语云:“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余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这里讲了对待自己著作的两种态度,刘勰、刘知己深怕自己辛苦一辈子的著作被尘土埋灭,被人视同粪土,想到这一层,禁不住“泣血涟如”。郭璞的态度没有那么伤感,自信他的著作是“拥篲清道”,拿着扫帚清扫了道路,以待后之君子来涉足。钱钟书先生说:“著书心事,不外此两端,读二刘语而悲者,得以郭语解之^①。”如果读了刘勰、刘知己的文章而产生悲观,不妨用郭璞的话开导开导自己,宽慰一下心情。那么,自己的心情如何呢?我深知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积力之作,因此不想在这里矫情。我只想说:我是自说自话,没有考虑到时髦不时髦。

① 《管锥编》第1237页。

钱钟书先生说：“我用我法，卿用卿法。”^① 他举出徐绩《徐节孝先生文集》所附江端礼所记《语录》云：“某少读《货殖传》，见所谓‘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为学之法。盖学能知人所不能知，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为善矣。人所共知，可略也。”^② 我写文章一向没有这么自信，只好守住一条：“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功利心、荣誉心过强，怕会把自己本来就贫瘠可怜的才智压扁了，那才叫真累人了！

我写本书的各章是缘于读钱钟书。

关于“钱学”，即是“钱钟书研究”的简称，已经有不少人热心于此。国内的一批著名学者和作家郑朝宗、周振甫、黄裳、柯灵、王蒙、舒展等自 80 年代初便重视钱学，厦门大学郑朝宗先生首倡，并招了研究生专门研究钱钟书著作。舒展先生 1986 年振臂高呼：刻不容缓地要建立钱学^③。并且很快有了《钱钟书研究》、《钱钟书研究采辑》丛刊出版，一些学者相继出版了钱学专著，虽然刚刚起步，但景象可喜。

但是，钱先生一直阻止此事，大泼冷水，他不承认有什么“钱学”，也不认为自己的著作就值得大家兴师动众地研究。他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甚至认为以一本书或以一个作家立一门学问根本不值得提倡。在《管锥编》中他讲了成熟的见解：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① 《管锥编》第 389 页。

② 《管锥编》第 385 页。

③ 《随笔》1986 年 5 期载郑文《文化昆仑——钱钟书——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

寥落千载，偏坐偏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朱学”之类，乃谓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①

热心人要建立“钱钟书研究会”，出版刊物，倡导“普及钱学”，以救正时下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粗浅、浮躁、滥靡之病，钱先生也不同意。

这样看来，倡“钱学”与阻“钱学”的矛盾似乎已势不两立。其实，二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钱之“阻”是反对把学问庸俗化，反对局限于对一学者的研究而带来困囿。这种担心虽有道理，但不是不可避免的。

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代表了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奇特文化成果，属于精英文化中的尖端部分，舒展称钱著为“文化昆仑”并非过誉。对于这样的成果，提“普及”显然不妥，“普及化”很容易导入庸俗化。事实上不但普及难矣哉，领悟、会心也绝非易事。曹丕云：“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②但是钱先生毕竟承认“二三素心人”的诚心诚意。这些素心人的倡“钱学”并不是把严肃的学问滥俗于朝市，并不想把“钱学”变成人人皆知，而又人人皆昧的时髦学问。而理由也不弱。其一，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钱钟书的《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旧文四篇》、《七缀集》相继重印或辑出，特别是《谈艺录》（补订本）和《管锥编》的赫然问世，人们发现了到底什么是学问。“钱钟书研究”已成为学界的新课题，虽然目前潜心者尚少，“票友”却很多，但也说明了大家的兴趣所归。其二，“钱学”在国外事实上已经存在，在美

① 《管锥编》第1401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

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新加坡、韩国、西班牙等国都有热心研究钱钟书的学者。他们称钱是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最出色的人物之一。意大利学者说,《管锥编》是地道的经天纬地的巨著。其三,“俗学”之忧,并非无据,但“钱学”今指钱的全部著作、学说思想、科学方法论,并非八股化的或学究化的空谈玄理,也并非对钱本人的偶像化研究。

话似乎说远了,现在回到本书的写作。书名定为《鲁迅钱钟书平行论》,显然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把钱、鲁两位文学大师相提并论。我想,从文化地位而言不会有人觉得唐突,但是要比较二人的文化思想、文学成就可能给人突兀感。钱钟书生于1910年,比鲁迅晚29年,根本不属于一代人,但他们毕竟都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杰出建设者,都是20世纪特定历史时空下,面对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搏击风浪的好身手,都是20世纪典型的作家、学者。他们虽非一辈人,也有可能见面,然而没有相会过。这也不必说遗憾不遗憾,我们完全可以让他们跨越时空的障碍进行对话。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也可以帮我们认识钱,更可以从对比中领会若干诗规艺律。于历史研究有益,于现代文化发展也可望有益一二。这也是钱先生所谓的“打通”理论。既然是求通,就有可通与不可通两种情况;事实上不可能、也无必要事事求通,强行疏凿,执力蛮拙。可通处也许忽然觉得互相照亮,不通处也不妨让彼此保持个性独立。这也是对鲁迅、钱钟书两位文学大师的真正尊重。

钱先生说:

我们讲西洋,进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

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①

鲁迅也讲过大致相似的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②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两难之论。要“打通”，何其难！但钱先生说：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③

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④

这两段话都讲“打通”是有科学根据的。人们的心意相通相契，为“打通”研究奠定了基础。钱先生学贯中西，学问博大精深，是最有资格提倡打通论的学者。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的真学力、真本领主要在此。……《管锥编》一书包罗万有，面对着这庞然大物，的确会使人感到目迷五色，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去认识它。但我想读者倘抓住‘打通’二字为线索泛览全书，就一定能逐渐看清其基本精神。”^⑤

至于作家之间的打通，实际上是跨时空的对话。钱先生在他的论文和著作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比如在《诗可以怨》这篇讲演稿中谈到“诗可以怨”是文人借诗排遣、慰藉、补偿的道理时，从诗

① 《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② 《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与名言》。

③ 《谈艺录·序》（补订本）。

④ 《谈艺录》第346页。

⑤ 《〈管锥编〉作者的自白》，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6日。

打通到小说、戏剧，让钟嵘同李渔对话，同弗洛伊德对话。“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和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①钟嵘《诗品·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嫖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正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史记·自序》中所说：诗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相一致，也可以说：弗洛伊德的补偿心理之说“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更在周楫和李渔的两段话里粗见眉目，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②这里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打通”的研究目的应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现在；再有，就是能打通则打通，并不强加蛮力。

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鲁迅研究是开展得早而持续时间也长的领域，研究现代文学，无论如何也绕不过鲁迅。近些年认识钱钟书、研究钱钟书也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必不可少的课题，也同样可以说，我们无法回避他的成果。请看柯灵对钱的估价：

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

^{①②} 《七缀集》（修订本）第125页。

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①

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钱先生的最高赞誉，这些并不比世界范围内的学者的赞誉过分的话，在国内尚未被更多的人知晓、接受。我想，也许“钱学”永远不会红火如炙吧，这不是不幸，在钱先生自己看来，是“幸甚至哉”的事。我们现在要说的是：既然现代文学史上不可能回避这两位文化巨人，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二人比较、合观的文化分析，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也需“二三素心人”勉力去做。笔者深知自己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是钱先生不是说过“绠短试汲”吗？

最后，关于本书的文体，请允许笔者作点说明。

容易看出，本书各章追求持论有据，笔法灵活，力避故弄玄虚，绝不存心吓人。自己确有所得便写，无得便罢，不计文章长短，但求一得之见。有的篇章不免横加联想，有的又存心钻牛角尖，但自觉趣味无穷矣！我想了想之后，发现有点受钱先生《管锥编》的启发。对于《管锥编》，钱先生说：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庶几比木屑竹头尔。^②

这几句幽默自谦的话意在说明，他的“管锥体”是自信的选用。作为另一个角度的表述，我们可以看他的《读〈拉奥孔〉》：

① 《促膝闲话钟书君》，《钱钟书研究》第1辑223页。

② 《管锥编·序》。

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不用说，《乐记》、《诗品》、《文心雕龙》、诗话、画说、曲论以及无数挂出牌子来讨论文艺的书信、序跋等等是研究的对象。同时，一个老实人得坦白承认，大量这类文献的探讨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礼节性地表了个态。叶燮论诗文选本，曾慨叹说：“名为‘文选’，实则人选。”（《己畦集》卷三《选家说》）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谚语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再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①

① 《七缀集》（修订本）第33—34页。

综合以上两段论述,我们便不难梳理出钱先生“管锥体”的文章格式与其学术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解除一条误会,钱钟书并非反对作系统的论文、论著,他也并不是不能作论文;他的论文集《七缀集》便可以作证。他反对的是学界一直存在的谈玄说空的风气,而提倡不沽虚名、鼎力实做的精神。他曾批判老子说:“欲以浑沦之心,上师浑成之物,语之自相违悖而事之不可施行者也。”他由此推而广之,不仅老子如此,“哲人之高论玄微、大言汗漫,往往可惊四筵而不能践一步,言其行之所不能而行其言之所不许。”^①大话说出,可以让听者惊奇,但没有可行性价值;说的是不能做的,做的又不是所说的。这种学问有何用处。我们的学问应该建立在言之有物,解惑释疑上。即使文章所解决的问题不大,也毕竟比前人前进了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极端地讲,宏大的论著如同庞大的建筑,经过时间的销蚀,作为整体可能会被后人否定,但其中的片段思想,即纯粹属于个人发现的东西如同塌房后剩下的木石砖瓦,还能于人有用。他所抨击的是学界历来的偏向:“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的浅薄庸俗看法,而认为“不耻支离”,不轻看竹头木屑的精神是可贵的。

钱先生还把那种不良的学术风气喻为“见林不见树”:

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瞻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无独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②

他的《管锥编》可谓见林又见树,既有宏观的打通,又有微观的解

① 《管锥编》第436页。

② 《七缀集》(修订本)第3页。

析、评判。他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① 这种评判常常是循环阐释的方法，“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tutische Zirkel）者是矣”^②。这正好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先是从文学作品中选择一个掌故，一条比喻，一种意境，一种手法等，再运用广博的知识加以考论、诠释，钱先生信手拈来，手边的材料浩浩荡荡，奔流笔底。这样的论论解决的问题反过来又加助了宏观认识作品的整体。而从全书看，若干点评札记构成的体系简直更是一个宏大体系，是宏大的人文系统工程。

本人不才，决不敢狂妄地与钱先生的方法相比，所以，常常通过借用钱先生的观点和材料来论鲁迅。也用鲁迅的材料反证钱钟书。我敬仰二位大师，愿如实地写清材料来源，是尊重科学，绝无掉书袋之意，钱先生说过：“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③ 我理解这意思是说：善于运用材料来解决问题并不比创造材料低能。我们没有抢到爱迪生的前头发明电，这是不必抱憾终生的，后人造出了许多电器，甚至电脑，也是很好的。在文学领域里，我们后人自诩“发现”、“创立”的理论，乃至学说，其实常常并不新鲜，是前人早已说过的话。我们之所以十分自信地在说、在写、在论辩，自然多因我们学问的渊博，但也说不定正好缘于我们的无知。如果已经了解过前人早已说过某种观点，只是未引起后人广泛注意，我们就应学习钱先生，老实地说清问题，不该昧良心充当发明家。这种态度是科学的，也是道德的。歌德是大学问家，他说过一句诚恳的话：“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

① 《旧文四篇》第7页。在《七缀集》中有修改。

② 《管锥编》第171页。

③ 《管锥编》第225页。